

和平紀念碑與「五四運動」

中環和平紀念碑的造型乃仿照倫敦白廳區的紀念碑，兩者外觀近乎相同。和平紀念碑於 1923 年揭幕奠立，目的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難者，當年碑文只有寥寥數字：The Glorious Dead (英勇就義)；其後加上年份刻文 1939-1945 以悼念二次大戰的死難者。1970 年代，紀念碑又加刻上「英魂不朽、浩氣長存」的漢字碑文，以追悼二次大戰日佔時期為港捐軀的烈士。

在香港主權移交前，香港軍事服務團每日早上 8 時及下午 6 時在和平紀念碑進行升降旗儀式。1997 年，升降旗任務改為英軍黑衛士兵團 (Black Watch) 負責。升旗儀式由三名旗手執行，旗手首先會在紀念碑向立法局大樓一面由左至右升起英國空軍軍旗，英國旗及英國紅船旗；然後走到紀念碑向香港大會堂高座一面，由左至右升起英國海軍軍旗，英國國旗及英國藍船旗，這樣的排列是與白廳的和平紀念碑一致。香港回歸後，官方每日的升降旗儀式改於金紫荊廣場舉行，由香港警察儀仗隊執行。

和平紀念碑頂部是一個石棺，石棺下面刻有「M.C.M」及「XIX」兩行文字。M.C.M 意即「凡爾賽和約」，而 XIX。即 1919 年。

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年間，中國飽經內憂外患，苦難深痛，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中國人受欺壓的情況愈來愈嚴重。1842 年 8 月 29 日，中英兩國代表在英艦「皋華麗」號上簽署《南京條約》，是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條不平等條約，揭開列強入侵序幕。

1860 年 10 月 22 日，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城，咸豐皇帝倉皇逃往熱河。1894 年中日「甲午之戰」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1895 年，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損失極其慘重，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

1900 年，英、美、法、德、俄、日、奧、意組成八國聯軍佔據北京，迫使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往西安。最終清廷被迫簽訂《辛丑和約》，付出巨額賠款，中國進一步淪為列強的次殖民地。《辛丑條約》主要除要求懲罰亂軍、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外，另外要求親王宗室需要親赴日本、德國道歉。軍事方面要求削平大沽、海口等炮臺，聯軍各國得駐守在北京到海口沿線要地，使館也得以駐軍，此後北京再無防備可言。

在列強侵略、不平等條約、外債賠款及捐稅交相侵襲下，中國老百姓的負擔十分沉重。當時的一幅漫畫傳單寫著：現在的郵政、電報、關稅、路礦，都被入佔去了，支離破碎，局面悲慘。

德國以「巨野教案」為藉口，於 1897 年出兵山東膠州。巨野教案，發生於 1897 年（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11 月 1 日，中國山東省曹州府鉅野縣磨盤張莊的天主教堂 2 名在堂內的德國聖言會神父能方濟和韓理加略由於不明原因被殺死。德國即以此為藉口，於 1897 年 11 月 14 日（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出兵強占膠州灣，並強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允許德國租借膠州灣、在山東享有修築膠濟鐵路和開採鐵路沿線礦產等特權。

1898 年 3 月 6 日強迫清政府簽訂《中德膠澳租界條約》，租借膠澳及其周邊地區九十九年，名為大德膠澳保護領（即膠州灣租借地），開放為自由港，成為西方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先例。

1898 年 3 月 6 日（清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清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與德駐華公使海靖在北京簽訂該條約。

同年 7 月 17 日在柏林互換批准書。共 3 條 10 款。主要內容有：

1. 德國租借膠州灣，租期為 99 年。
2. 租期之內，由德國管轄租借地，中國不得治理；德國得以在租借地建造軍事設施，保護自身利益和安全；德國有權制定膠州灣水域管轄章程，以約束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來往船隻；德國可在膠州灣外緣各島及險灘設立浮標，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過往船隻一律交納費用。
3. 在膠州灣沿岸百華里內，德國軍隊可隨時通過；中國政府在膠州灣沿岸百里範圍內頒佈法令、派駐軍隊，均要事先取得德國同意。
4. 德國獲得修築山東境內兩條鐵路權：一條由膠州經濰縣、青州、博山、淄川、鄒平達濟南及山東界，另一條經沂州（今臨沂）和萊蕪至濟南；德國擁有鐵路沿線 30 華里內地區的開礦權以及為山東省各項工程投資、供貨和提供勞務的優先權。
5. 若德國自願提前將租借地歸還中國，中國須賠償德國在膠州灣支出的全部費用。該條約使山東變成了德國的勢力範圍。

是年 10 月，德皇將租界內新建的市區命名「青島」。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二千多年的帝制，孫中山獲選為臨時大總統。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民國，但政權很快就落在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中。

1914 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以對德國宣戰為名，出兵中國山東，強佔德國租借中國的膠州灣(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1914 年 8 月 15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向駐中國德軍提出最後通牒。同年 10 月 6 日，日軍佔領濟南車站，並於 11 月 7 日攻佔青島。德國佔領青島後，曾於信號山麓崖勒石，上刻飛鷹國徽，下款佔領年月及將領姓名。1914 年日軍侵佔青島後，復勒日本大正三年十一月七日字樣於其上。

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秘密文件《日華條約》。

全文共五部份，計二十一條，所以一般稱這條約為《二十一條》。袁世凱為了稱帝，在日本威迫利誘下，屈辱地接納其中大部份條款，只對第五部份要求「容日後協商」。消息傳出後，全國人民義憤填膺，將 5 月 9 日定為「國恥日」。

以下是被稱為賣國條約的「二十一條」的內容及重點意圖：

第一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互願維持東亞全局之和平，並期將現存兩國友好善鄰之關係益加鞏固，茲以定條款如下：

第一款：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第二款：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租與別國。

第三款：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第四款：中國政府允諾，為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其應開地方自行協定。

(承認日本接收山東省內德國舊有的權利)

第二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中國承認日本國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茲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款：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為期。

第二款：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第三款：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

第四款：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國臣民。至於擬開各礦，另行商議。

第五款：中國政府應允，關於左開各項，先經日本國政府同意而後辦理：

一、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用款項之時。

二、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由他國借款之時。

第六款：中國政府允諾，如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

第七款：中國政府允諾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為期。(延長旅順大連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並進而圖併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

第三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顧於日本國資本家與漢冶萍公司現有密切關係，且願增進兩國共通利益，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國政府同意，所有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第二款：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

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許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公司恐有影響之舉，必須先經公司同意。

(圖奪我國漢冶萍公司及其所有礦山)

第四號

日本政府及中國政府為切實保全中國領土之目的，茲定立專條如下：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圖奪我國沿海港灣及島嶼)

第五號

第一款：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

第二款：所有中國內地所開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第三款：向來日中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輾轉之事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為日中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畫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第四款：中國向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第五款：中國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線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

第六款：在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之時，先向日本國協定。

第七款：中國允認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圖奪我國政治、財政、軍事、警務諸種特權及築路、採礦、興學、傳教權。)

1915 年 6 月 1 日，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了《二十一條》的批准書。北洋政府外交官曹汝霖、章宗祥專責與日方談判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被指媚日賣國。「二十一條」的簽署後，激起全國百姓憤慨。

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凱不顧國人反對，倒行逆施，企圖復辟帝制，激起全國各地展開護法運動。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凱就在全國人民一片唾罵聲中死去。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又發生了「張勳復辟」事件，繼而軍閥段祺瑞把持持政權，一再出賣國家主權，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及北洋「賣國」政府強烈不滿，民

氣愈來愈沸騰，「火山」即將爆發了。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軍閥爭權，北洋政府內爭不斷。

1917 年，黎元洪與國務院總理段祺瑞不和出現「府院之爭」。隨後更爆發「張勳復辟」的鬧劇。1917 年 7 月 1 日，長江巡閱使張勳以調停「府院之爭」為由，率軍入京擁護末代皇帝溥儀復辟，前後歷時共十二天，被段祺瑞討伐，最終失敗，張勳流亡天津。

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政權由軍閥段祺瑞把持。段祺瑞主導的北洋政府終止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廢除中華民國國會。1917 年 7 月，孫中山南下廣州，對段祺瑞政府展開護法制裁

從 1917 年 7 月起，段祺瑞命交通兼財政部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等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1918 年，曹汝霖與日本外相後藤新平商定，以高徐、濟順兩鐵路權為抵押，借款三千萬日元。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還簽署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主要內容為「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日軍撤走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代替。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段祺瑞在致日本外相後藤新平《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的答覆中，竟對日本強奪山東主權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在隨後的巴黎和會上，日本即以此作為強佔山東的藉口。

五四運動的醞釀與爆發

晚清時期，西方各種思想大量傳入中國，至民國初年，高等教育在中國進一步發展，促進了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領導下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開放學風。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從思想、政治和文化領域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

社會層面上，中國工商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展迅速，參與民族工業的人口持續增加，城市中的工商階層成為了五四運動中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但列強為保各國既得利益而偏袒日本，作出「山東議案」，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交給日本。對此，北洋政府竟然準備在「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中國民眾群情激憤，愛國情緒高漲，社會各界紛紛抗議日本無理行徑，學生和新冒起的思想領袖們得到民眾的支持，發起一連串愛國行動，要求「內懲國賊，外拒強權」。掀起中國現

代史序幕的「五四運動」就此爆發了。

導火線：巴黎和會外交失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協約國於 1919 年初在巴黎召開「巴黎和會」。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參與，卻成為被宰割的對象。會上中國代表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取消日本強加於中國的「二十一條」，以及收回山東權益的要求。1916 年 12 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採取「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先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到北大任教，鼓勵學生培養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

《青年雜誌》於 1915 年 9 月 15 日創刊，出版一年後改名《新青年》，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提倡「德先生」(民主 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 Science)。在蔡元培的支持下，

《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由上海遷至北京北池子箭桿胡同九號（今二十號）

李大釗(1889 – 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俄國十月革命後，李大釗等開始向國人介紹十月革命，傳播馬列主義。「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和知識份子當中作了不少播種工作。1927 年 1 月被軍閥張作霖殺害於北京。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於 1918 年，由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業，轉移末世風氣」為宗旨，在「五四運動」前後表現十分活躍。

《每周評論》由李大釗和陳獨秀於 1918 年 12 月在北京創辦。該雜誌及時反映和評論國內外大事，宣揚反帝愛國，振興中華，積極推動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1919 年 8 月被北洋政府查封。

辛亥革命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中國工商業趁機取得比較迅速的發展，工商業人口持續增加，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社會的地位日益重要，成為「五四運動」中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

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派出多達十四萬華工到英、法戰場支援協約國前線工作。1917 年 8 月 14 日，北洋政府對德國宣戰，成為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成員。1918 年，徐世昌經皖系軍閥操縱的安福國會選舉為中華民國大總統。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徐世昌向各國外團宣告協約國勝利。

1918 年 11 月，北洋政府召開大會慶祝一戰勝利，在故宮太和殿舉行盛大的中外軍隊閱兵式，鳴響禮炮。受閱部隊由中、美、英、法、比利時、日本、印度、安南等八國軍隊組成。這也是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在首都對中外軍隊進行檢閱。

1919 年 4 月，列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巴黎召開會議。中國一心收回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然而事與願違，和會竟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日本同時拒絕取消「二十一條」。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全權代表顧維鈞。顧維鈞在和會上發表《山東問題說帖》，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教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講話震撼歐美代表，扭轉了輿論形勢並博得同情，可惜最後依然功敗垂成。

1911 年 2 月 5 日，時任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長的林長民，於《北京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的文章，證實中國於巴黎和會上交涉失敗的消息。列強在巴黎和會偏袒日本，山東歸還無期，消息傳來，舉國震驚。

「罷不罷，看北大。」1919 年 5 月 3 日深夜，當巴黎和會不利消息傳出後，北京大學學

生滿腔悲憤，北大全體學生和十餘所學校生代表逾千人連夜在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內，(即後來的北大三院)緊急聚集，商討對策。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

-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
- 三、通電各省於 5 月 9 日國恥紀念日舉行遊行示威運動；
- 四、定於 5 月 4 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

隨後，北京高等學師範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十三校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議下午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

五四運動的經過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學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門前集會，舉行示威遊行。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誓死力爭，還我青島」等口號，一致要求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簽訂「二十一條」時的外交次長，當時任交通總長)、陸宗輿(簽訂「二十一條」時的駐日公使，當時任幣制局總裁)、章宗祥(當時的駐日公使)。遊行隊伍到達

趙家樓後衝進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躲藏起來。民眾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並放火焚燒曹宅。

運動迅速由北京向全國發展，天津、上海、長沙、濟南、武漢、廣州等地大批學生紛紛示威聲援。各地商人、工業家和城市工人都對這項大規模的愛國行動表示同情與支持。面對北洋軍閥鎮壓學生，中國工商界實行罷工罷市聲援。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發動大罷工，參加的各業工人六、七萬，加上手工業工人、店員等，達十多萬人。6月10日，罷工達到高潮，滬寧、滬杭、淞滬等鐵路工人舉行總罷工，上海水陸交通全部斷絕。接著，唐山、長辛店、天津、長沙、濟南、南京、武漢、杭州等地工人亦相繼遊行和罷工。在工人和學生推動下，上海和全國各重要城市商人也舉行罷市。終於迫使北洋軍閥政府讓步，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並於1919年6月28日宣佈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集會於天安門，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會後舉行遊行示威。「五四運動」就此爆發。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學生通過罷課決議，學隊伍從北京大學紅樓出發遊行。隊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要求會見英、美、法、意四國公使，羅家倫、江紹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備忘錄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示威遊行的學生在東交民巷受阻，隊伍矛頭轉向「內懲國賊」，要求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遊行隊伍走到趙家樓，曹汝霖越牆逃跑，示威學生激於義憤，火燒曹宅。

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進行鎮壓。五月四日拘捕了學生三十二人，後由北大校長蔡元培作保，營救獲釋回校。但當局下令查辦北大，要各校將獲釋學生送交法庭訊，並放流言中傷蔡元培。

五月四日事件發生後北洋軍閥將北大三院用作拘留學生的臨時監獄，將大批學生軟禁起來。1919年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鄧中夏任總幹事，並定十九日起全市總罷課

「五四運動」後，覺醒了的女性紛紛走出閨門，自覺振興中華，男女有責。「五四運動」可說是開啟現代中國女性婦女運動的先河。

1919年5月9日，清華學生舉行「五九國恥紀念會」，通電巴黎，要求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全體同學當場發表了以下宣言；「口血未乾，丹誠難泯，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九日，清華學校學生，從今以後，願犧牲生命以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此誓。」宣誓後，當即在大操場焚燒校內的日貨。由北京學生發起的愛國運動很快得到全國各階層響應。

北京「五四運動」學生集會遊行遭到北洋軍閥政府鎮壓的消息傳到上海，激起上海民眾憤怒。誓保國土完整。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兩萬多人在公共體育場(今上南體育場)舉行國民大會。5月11日，上海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上海學聯散發的傳單，為「請看北京學生的大劫」，傳單呼籲各界團結，促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

1919年6月4日，上海學聯接到天津急電，立即油印分發動員罷市支持。上海的學生和工人走向社會，向民眾開展拒簽《巴黎和約》的行動。1919年5月26日，上海各校學生宣誓總罷課。上海商界遊行，要求釋放遊行被捕的學生。1919年6月10日，上海全市工人大罷工，並走向街頭示威遊行，是日上海水陸交通全部中斷。1919年5月17日，上海救國十人團在上海《申報》發文敬告先施、永安公司不要賣日貨。先施、永安兩公司隨後在月27日

《申報》上聲明；準「四月念三日起實行不賣日貨。」上

「五四運動」爆發後不久，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在上海市先施公司樓上召開全國學聯第一次代表大會。1919年6月16日，第一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議決，宣告成立全國學生聯合總會。列強在上海的勢力對當時民眾的愛國運動十分敵視，並出動武裝進行監視。天津商界急電，要求罷免曹、章、陸三人。天津各界遊行：山東不可失、青島不可失，中國要完整統一。1919年5月7日，山東各界六十二團體假山東省議會召開國恥紀念大會，到會者三萬人。部份出席者義憤填膺，寫成「良心救國」血書。

1919年6月28日，山東請願團代表一百三十多人遊行至北京，向北洋軍閥政府請願，

要求中國政府不要在山東問題的賣國條約上簽字。大總統徐世昌接見了請願代表。

「五四運動」時期，「抵制日貨成為當時全國人民的共識。國內商號抓住時機，宣傳

國貨。

周恩來(1898 – 1976)，字翔宇，浙江紹興人。「五四運動」期間在天津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並組織和領導了天津的學生運動。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他以飛飛為筆名，發表許多多篇社論和短評。

「五四運動」時，屈武被陝西學生選為全省學生聯合會長。為拒絕巴黎和會簽字，他代表陝西學生進京請願，以頭撞壁，血流如注。屈武是于右任女婿，與蔣經國是蘇聯莫斯科大學大學的同學，二十七歲即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晚年曾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惲代英，江蘇省常州人。「五四運動」時在武漢擔任學聯《學生報》的指導，積極組織學生罷課及遊行工作。1927 年 12 月領導了廣州起義。1931 年 2 月被捕。4 月 29 日被槍決於國民黨南京軍人監獄。1926 年惲代英譯的《階級爭鬥》、批判資本主義，論證社會主義必然取而代之；加上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及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都是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義的書籍。

毛澤東，湖南省湘潭韶山人，「五四運動」時領導湖南群眾運動。《湘江評論》，1919 年 7 月 4 日在湖南長沙創刊，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創刊號刊登了署名毛澤東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指出：「甚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孫中山對「五四運動」深表支持。1919 年 7 月孫中山致電廣東政府，要求立即放因參加愛國反帝運動被捕的工、學界代表。

1921 年 11 月至 1922 年 2 月，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國際會議。中國政府派出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三人為首的百人代表團。華盛頓會議的議程主要處理限制海軍軍備問題及太平洋和遠東問題。中國和日本還在會議期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他附約。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五四運動」在香港

「五四運動」發生後，1919 年 5 月 11 日，廣東召開了「國民大會」，十萬群眾一起聲援「五四運動」愛國學生的行動。5 月下旬，廣東省學生聯會宣告成立，當

時港英當局為穩定其管治，急起防範應對，嚴訂苛刻警律，包括一切集會遊行都要經過華民政務及警察當局許可，否則就以「不受歡迎人物」為由，驅逐出境，以震懾在港中國人。

與此同時，辛亥革命後一些晚清遺老寄寓香港，對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相當抗拒，在文化教育領域散播封建保守思想，但然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已震撼全國，愛國反的潮流已經形成，國難當頭，香港年輕一代怎能不受到觸動與影響呢？

周恩來一生來過香港四次，最初一次是在 1920 年，並途經香港住了一天。「五四運動」過後不久，為進一步尋求中國富強之路，當時二十二歲的周恩來於 1920 年 10 月從天津前往法國勤工儉學，11 月 7 日在上海登上「波爾多斯」號郵船，輪船途經香港停留一天。在港期間，周恩來得到在南開讀書時結交的同學好友，正在香港大學讀書的石志仁接待。石志仁請周恩來留在香港大學宿舍，暢談壯志理想。石志仁是著名鐵路專家，1922 年在港大工程系一級榮譽畢業，獲公費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繼續深造，1926 年懷著救國理想回到中國，致力振興中華。1949 年出任新中國第一任鐵道部副部長，他在鐵路領域貢獻重大，也是港大校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最高級官員。

1955 年 12 月 23 日和 25 日聖誕節期間，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專程來京訪問的香港大學外籍教授團，以及陳丕士大律師和陳君葆教授等一行。在這次會面中，周恩來請當時鐵道部副部長石志仁一起參與，並首次公開透露了他「五四運動」後第一次來港情況。1955 年 12 月 23 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見香港大學英籍教授團一行。石志仁出席。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各國在戰爭中損失了大量船隻，急需補充，從而為香港的工商業和造船業帶來機遇。1916 年開始，香港太古造船廠、黃埔造船廠、海軍船塢陸續收到訂單，為外商建造大型商船。

1917 年 3 月，太古造船廠建造的藍煙囪貨輪「愛閣里加士號」，是當時英國在海外建造的最大商船。香港造船業取得發展的同時，亦為香港準備了產業工會的發展機會，工人力量在香港迅速擴大。由於戰爭影響，原本依賴歐洲供應香港和東亞地區的食品和日用工業品短缺，一批港商趁機投資設廠供應市場。

1914 年香港大興織造廠和南華皮具廠開辦，1916 年祥發罐頭食品廠和中華兄弟

製帽廠開辦，進一步促進了香港工業發展，擴大了華商實力，亦為「五四運動」後香港青年抗日運動和工人運動奠定了基礎。

1902 年及 1905 年，日本與英國先後簽訂了兩次英日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英國駐日本大使格林即於 1914 年 8 月 4 日求見日本外務大臣加藤高明，提出戰事若波及遠東，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威海衛若受德國襲擊，英國希望日本給予援助。

1914 年 8 月 7 日，格林再向日本送交英國政府照會。當時日本籍的僑民多居住在灣仔春園街一帶，與華人雜居。日本僑民在港人數遠超過歐美族裔，港府對日本商店僑民亦給予優待。

1915 年，香港灣仔地區曾發生過抵制日貨，民眾向日本商店擲石衝擊等事件，但久即平復下來。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生運動爆發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5 月 11 日，廣州召開國民大會聲援，十萬人參加。5 月下旬廣東省學生聯合會成立。6 月 3 日開始，上海和全國各地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消息傳到香港，不少市民和青少年義憤填膺，亦紛紛行動起來加入抵制日貨。一些中文報章如《華字日報》亦連篇發文，在輿論上發起支持。

在香港大學，時任學生幹事的陳君葆，曾長期擔任港大教授和馮平山圖書館館長，與校內五十多位同學一起聯名爭取以大學名義致信巴黎和會聲援，為中國主權據理力爭，但遭到校方「勸喻」。最後改以「香港中國學生」名義拍發電文到北京聲援北京學生和遣責賣國賊，表達香港大學生關心國家命運，挺身而出，抗拒列強的愛國熱情。在港島灣仔，有民眾湧至日本商店門前擲石示威，高呼「抵制日貨」口號，警察迅速到場，但群情洶湧，事件持續數小時未平息。港英警察不得已，只好勸日本商店緊閉門戶，暫停營業，亦勸日僑留在家中，不要外出招搖。這時，香港幾家私立漢文學校的語文老師，亦在講壇上慷慨激昂，陳述國恥，激發學生的愛國心，並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作為課文命題。

在社會上，一些家庭主婦以「中興猴嘜」火柴是日本產品，拒不使用。華商則在會所集會，決議提倡國貨。各大公司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宣言今後必定要多採辦國產絲綢、蘇杭雜貨，並歡迎各界到公司檢查有無「仇貨」。一時之間，陰丹士林及愛國布在香港大行其道。

英資太古洋行副買辦蔡功譜也激動地說：「日本出口商品，海味是最大宗，但魷魚、

鮑魚、江鰔柱等等，只向我國銷售，因此每年攫取我國金錢不少，從而製造武器侵略我國，若我國人齊心協力，三年內都不吃日本海味，則日本立即窮困，即欲侵略我國亦無得逞。」是不是不吃日本海味，就能使日本衰弱，事情可能並不這樣簡單，但當時社會各階層的義憤和愛國情懷確實溢於言表。

當時有些學生將日本雜貨搬到中環荷李活道及擺花街交界處，即中央警署附近當眾燒毀，表示他們悲憤的決心。在多年之後，塘西舊侶(羅豐銘)在《孫壽康與我》一文中，曾經紀錄了 1919 年學生上街遊行情況，節錄如下：

「那一天(日子已忘記)是中午時分，突然有一批學生，持『愛國傘』遊行，所謂愛國傘，是福州出品的油雨傘，他們『提倡國貨』，無異叫同胞『抵制日貨』，一行二三十眾，浩浩蕩蕩，到了蘇杭街口，這一群遊行的學生，高舉『陶英學校』的旗幟，該校校址在歌賦街，屬於私立的英文小學，由最低第八班至第四班，故學生的年齡介乎八歲至十七八歲之間，他們可能由學校出大道中，轉入蘇杭街，即為治安當局聆悉，一方面通知校長，一方面派警察予以解散，他們當不敢反抗，只好收拾旗幟、雨傘等物。校長聞訊，隨同報訊的警察，到了遊行的地點，吩咐學生不准『多事』，收隊各自回家，亦不准他們返校『歸隊』，以免他們再集會討論應付步驟，他們多半是班級較低的學生，多少畏懼校長知會家長，嚴加管束，所以乘乘地遵命，一哄而散。」

老牌英文學校「大書館」的學生亦相繼奮起行動。皇仁書院、英皇書院、英書院、聖士提反、聖保羅等校學生都發起了集會，學生行動令港英當局深為震驚，怕事態擴大，更怕香港中國學生聯合起來形成力量，於是匆匆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港英政府全體警察，包括英警、印差、華差，一律停止休假。加派武警在灣仔日本商店門前及附近街夜巡邏站崗。後備警察原本已在 1918 年底結束，現在又重新召集，配備槍支彈藥晚間在花園道、堅尼地道、后大道中直至軍器廠街一帶巡邏當值。當局對於日本僑眷則送食送水，防備出事。駐香港的日本領事害怕香港的中國生醒覺，向香港當局提出照會，要求香港教育司指令漢文視學官查看香港各私立漢文學校，如有採用中國上海會文堂出版的《初學論說文範》作為課本的，應即厲行禁止。理由是該書內容有提倡貨，抵制日本的言論，有傷日本體面和妨礙英日邦交云云。香港華文視學官羅仁伯奉命在灣仔的私立漢文學校調查，看看各中文學校《論說文範》課本有沒有存貨，如有，即行沒收。

對於學生籌組學生聯合會，港英至為害怕。塘西舊侶的回憶錄寫道：「突然，一位(學生聯合會)籌備委員，從教育司署方面聽到一項非常不利的消息：陶英學校自從學生遊行之後，已被教育司署列入『黑名單』，密切注視其動態，同時有不少畏事的家長，即使自己的子弟沒有參加遊行，亦恐其受牽累，紛紛叫子弟退學云。在此情形之下，『學生聯合會』不特沒有成立的可能，最怕教育司根據這份籌備會名單，分別知會各個學校的校長，嚴加管束，校長大都是頑固分子決不肯讓『滋事』的學生繼續攻讀，怕將來惹是非 ----」。

但是愛國抗日的火焰既已點燃，正如魯迅所說，根子壓在頑石上，只好彎曲地繼續生長，年輕一代學生逐漸醒覺，愛國理想轉向基層默默發展，從而為稍後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和抗日青年工作準備了力量，學生籌辦夜校，工人建立工會「五四運動」席捲全國，年輕一代命運與國家主權榮辱緊密相連。香港一些高年級學生看到「喚醒民眾」的重要，他們日間在英文書院肄業，節衣縮食，解囊捐款，夜間在西營盤及荷李活道租賃地方，設立了策群夜義學，除任教員外，還免費供給書籍紙筆，向貧苦兒童灌輸知識，促進民間愛國教育發展。

各行各業的工友，亦逐步團結起來，組織工會，按「合法」程序呈報香港華民政務司立案，如海員工會(初名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於 1921 年 3 月 6 日成立、同德工會等等。此後幾年，工人運動、青年運動人才輩出，湧現出蘇兆徵、林偉民、鄧發、陳郁等重要領袖。

1922 年 1 月爆發了香港海員大罷工，並為 1925 年省港大罷工、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建立學生賑濟會等，奠下了重要基礎。香港工人運動的勝利，給孫中山帶來很大的啟發，堅定了日後喚起民眾、「扶助農工」的重要政策。

「五四運動」後三年，香港發生了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 1922 年 1 月海員大罷工。1919 年，司徒拔來港任新港督，加強對學生監管工作針對「五四運動」對香港社會變動的衝擊，港府多方調監管華人學校，除原有漢文視學官羅仁伯、漢文視學員劉叔厭外，更增加漢文視學官余芸、漢文視學員林伯聰，分段巡迴視察各私校。灣仔及九龍由羅主管，中環、上環及西營盤由余主管，多方限制，可見那時要開展愛國教育和學運工作阻力重重。港府重新釐定各私立漢文學校課程，改為小學七年級，課本一律要呈請港英當局批准。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一律要使用《香港國家簡明漢文讀本》，宣揚英皇法政和尊孔讀經。

一時間，讀經復古空氣在香港到推崇。為宣揚聖道，正人心，挽狂瀾，旗昌洋行買辦馮其焯每月認捐百數十元，在灣仔天樂里設立「中華聖教會」印行《樂天報》，每月二期，由前皇仁學院退休教員李不懈、陳冠干等主編，一切論說都援引孔孟之道，排斥新文化運動影響，可惜不受青年一代學生歡迎，該刊發行不久，即以經費短缺而停刊。

新文化跟隨時代潮流在香港逐步發展。那時期英華書院的出版工作很有名，《英華青年》初創於 1919 年 7 月 1 日，是「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之際，《英華青年》創刊詞申明該刊宗旨是溯自歐風美雨，飄灑東亞，新舊思潮，澎湃盪漾，思互相融合，以成一種文明偉大之學問。」

1924 年第一期的《英華青年》刊登了一篇由鄧傑超所作的小說《父親之賜》。小說作者以「傑超按」明確指出：「為『五四』風潮痛恨曹陸章三人賣國而作，發表在本校季刊上。」這種直接表現「五四運動」歷史風雲的愛國小說，即在當時內地的新文學作品中也很罕見。

1927 年 2 月 18 日，中國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專程來港，在上環青年會發演講，禮堂坐滿年輕聽眾，魯迅當晚發表《無聲的中國》，19 日下午再發表《老調子已經唱完》，兩篇演講都引起極大轟動，影響深遠。設立在荷李活道的「萃文書坊」，趁勢售賣新文化書籍，雖然不時被警察查究干涉，沒收書籍不少，但新書一到，讀者聞風而動，搶購一空。

到了 1935 年，許地山教授來港主持港大文學院，馬鑑、陳君葆亦先後加入香港大學文學院任教行列，提升了港大中文系教授陣容，新文化力量得到壯大發展。隨後兩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許多新文化主將先後來港，出版報刊，創作電影，開展各項介紹新思潮、新文化和抗日的活動，香港文壇蓬勃發展。新文化於在香港出現了新景象。1938 年，徐悲鴻、陳寅恪等後來港大參加活動。壯大了新文化在香港的力量。

五四運動的影響

「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深遠的影響，促進了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萌發，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其後，在中共協助下，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反對軍閥和反帝國主義的思想得到壯大發展；白話文學從此走向蓬勃，而民眾普及教育也得以加快；各種報刊出版和民眾輿論深入傳播，儒家觀念大受衝擊；民主科學精神有所發揚，

女權運動興起。而大批中華民族的精英，在此後的漫長歲月中，為了拯救危困的中國，為了國家領土的完整統一和獨立富強，不顧安危，前仆後繼，犧牲奮鬥，振興中華，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和史詩般的傳奇經歷。

孫中山論「五四運動」："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撓其鋒。

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大放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者，可無疑也。

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無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舉。"(1920年1月29日孫中山《致海外同志一信》

「五四運動」以後，傳播新思潮的團體、報刊紛紛成立，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預備了條件。李大釗是「五四運動」領導人，也是中共始創人之一。他於1920年3月領導北京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五四運動」爆發後數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並創辦《勞働音》月刊和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左)，為中共的成立作準備。

1920年8月，上海出版了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為該《宣言》在中國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

1920年8月，一些知識份子在上海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的辦公地點設於上海市龍華路漁陽里六號。新民學會由毛澤東、蔡和森於1918年4月在湖南成立，該會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提倡「改造中國與世界」。在1919年，新民學會組織領導湖南各界，積極參與和響應「五四運動」。

1919年至1920年間，毛澤東以新民學會會員為核心，在湖南發起驅逐軍閥張敬堯運動，為此，他兩度到北京。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形勢危急，孫中山決定離開廣東到上海，並致電國民黨上海事務所，請他們密電李大釗即赴上海會商國民黨改組問題。

「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女權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婦女權利在「五四運動」影響下發

生變革，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很大的衝擊。在「開放女禁」呼聲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等自 1919 年秋開始陸續招收女生。

在五四運動」推動下，大批青年赴外國找尋新思想，赴法勤工儉學成為潮流。當時學員中最年長的是新民學會發起人蔡和森之母葛健豪，時年五十四道，行前她對送行者說：「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義，我們現在去留學，將來回國就可以幹一番救國救民的大事。」

這番話激勵了當時無數愛國青年。1920 年 7 月 6 日，留學法國的湖南新民學會會員在法國蒙達尼舉行會議，討論會務發展方針和改造中國的道路問題。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后一天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陳公博、周佛海等。他們代表著全國 50 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工人運動取得長足發展。1922 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書記李大釗派員到石家莊，用正太工業研究會傳習所名義組織工人工作，是為正太鐵路總工會的前身。「五四運動」促進了中國的學生運動逐步與工人運動結合。

20 世紀初，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香港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一次是 1922 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一次是 1925—1926 年的省港大罷工。此後，工人運動在香港仍繼續發展。香港的工人運動為中國共產黨鍛煉和培養了一批骨幹和領袖人物，林偉民、蘇兆徵、陳郁、曾生是他們的傑出代表。林偉民和蘇兆徵曾帶頭發起香港海員大罷工。海員大罷工以後，林偉民和蘇兆徵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 年，林偉民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在省港大罷工時被推選為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兼財政委員會委員長。他們是早期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

導人。

1926 年 7 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1926 年 9 月馮玉祥(左)得到蘇聯和中共幫助，參加國民革命。1926 年北伐期間，許多共產黨人在北伐軍中擔任政治工作，包括郭沫若、林伯渠。1927 年 1 月，北伐軍進駐漢口英租界。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開始。新中國成立後，定 8 月 1 日為中國人解放軍建軍節。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整個東北在次年二月全部淪陷。

中國青年學生繼承「五四運動」傳統，關心國是。1931 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後繼續向華北入侵，中華民族面臨重大危機。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學生舉行示威，要求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期間被軍警用水龍噴射，仍凜然不屈。

1937 年 7 月 7 日，日軍製造「七七事變」，拉開中日全面戰爭的序幕。十天後，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說：「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不久，共產黨的「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第一一五師在山西平型關附近伏擊日本軍隊，取得了抗戰以來第一次大勝利。這次勝利打破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振奮了全國的人心。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相繼對日宣戰，中國也於 1942 年 12 月 9 日，對日、德、意宣戰，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員。

1945 年 5 月 4 日，「五四運動」二十六周年的時刻，雲南省昆明市西南聯合大學和各校學生二萬多人遊行示威，反對當局消極抗日，要求民主進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持續十四年的抗日戰爭取得了最終勝利。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雙方於 1945 年 10 月 10 日簽訂了《雙十協定》。1946 年 1 月 10 日簽訂了《停戰協定》。1946 年 6 月底，國民黨撕毀停戰

協定和政協決議，對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解放戰爭正式開始。

1948 年「五四運動」二十九周年時，中國學生在全國各地舉行集會、罷課、遊行示威，反對美國在戰後積極扶植日本。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先

後進行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殲滅了國民黨軍主力，解放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1949 年 4 月 21 日，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渡江部隊摧毀國民黨軍的「長江防線」。4 月 23 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到 1949 年 9 月底，全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獲得解放。

1949 年新中國政府成立後，將五月四日定為中國青年節。

「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文學的新時代。在「五四運動」推動下，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現代文學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經歷了文體轉變，確立了白話文在中國社會的主體地位，湧現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冰心、沈從文、老舍、聞一多、朱自清等文壇巨匠。

中國興起的思想界領袖和知識分子，希望通過思想變革、社會變革、文化變革來建設一個強大的新中國，振興中華著名作品流傳後世，對中國文壇發展深影響深遠。1917 年 2 月，陳獨秀於《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明確提出「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主張以革新文學達至革新政治。改造社會。

胡適(1891 – 1962)，1917 年任教於北京大學。提倡新文學運動。1917 年 1 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8 年 4 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倡白話文，寫白話詩，是新文化運動重要領袖之一。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張：

- 一，要言之有物
- 二，不模仿古人
- 三，要講求文法

四、不做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爛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五四運動」前後，文學家如胡適、魯迅、李大釗、周作人、吳虞等紛紛在《新青年》發表文章。

「五四運動」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魯迅(1881 – 1936)是新文學運動的旗手，受到年青人及知識份子的敬重。他的許多作品，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極大影響。1918年5月15日，三十七歲的周樹人首次以「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發表中國現代史上首篇以現代體式創作的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1936年10月，宋慶齡、巴金等出席在上海萬國公墓紀念堂舉行的魯迅葬禮。當魯迅出殯時，萬眾哀悼，上擠滿了送葬的人群。

錢玄同(1887 – 1939)，語文改革家、文字音韻學家、「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一。錢玄同自1913年起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授音韻學，並長期擔任國文系主任。1917年，他向《新青年》雜誌投稿，倡導文學革命，並於1918年至1919年間擔任《新青年》雜誌編輯。

劉半農(1891 – 1934)，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詩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先驅之一。

聞一多(1899 – 1946)，著名詩人、學者。

聞一多積極參與「五四運動」，曾代表學校出席上海舉行的全國學聯會議。1920年4月發表其第一篇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西岸》。

「五四運動」以後，一些經歷新思潮衝擊的知識分子，希通過文藝作品表達自己的政治苦悶與人生理想，在文藝創作取得突破，新的文學團體相繼應運而生。「文學研究會」為中國最早的現代文學團體，成立於1921年1月4日，創始人包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周作人等。其後冰心、朱自清、夏丏尊、老舍、劉半農、徐志摩等相繼加入，對中國現代文學和白話詩歌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冰心(1900 – 1999)原名楊婉瑩，當代著名作家，1918年入讀協和女子大學理科，

立志成為醫生，後來受「五四運動」影響，轉讀文學系。「五四運動」時，她被推選為大學學生會文書，參加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宣傳股的工作，後來還加入了文學研究會。

巴金(1904 – 2005)，是「五四運動」以後成名的著名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多年。

羅家倫 1897 – 1969)·1919 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成立新社，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時，羅家倫親筆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口號，並於 5 月 26 的《每周評論》上首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一直沿用至今。1928 年 8 月，清華學校更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首任校長。

傅斯年(1896 – 1950)，著名 文史學家。1916 年考進北京大學文科，受到民主與科學

新思潮熏陶，1918 年夏與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五四運動」爆發時，傅斯年曾擔任遊行總指揮。

朱自清(1898 – 1948)，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五四運動」後湧現的著名作家、詩人、散文作家和學者。著名作品有《背影》和《荷塘月色》，他就讀北京大學時，是新潮社的成員，「五四運動」期間為平民教育演講團團員。

創造社是「五四運動」後出現的重要文學團體，成立初期以反對封建文化為目標，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忠於自我，展現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在文學青年中激起共鳴。

郭沫若的詩集《女神》、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郁達夫的小說《沉淪》，都是當時具影響力的代表作。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當日下午三時，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城樓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北京群眾聚集於天安門前見證開國大典。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結束了中華民族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標誌著中國邁入獨立、自主、走向富強的新時期。

資料來源

動與醒 - 孫中山紀念館 (2019 年)

五四運動與民族復興圖片展 - 中央圖書館 (2019 年)